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淡泊自守的学者钱钟书

吴楚七国之乱

西汉中后期的奢侈之风

金庸古龙比较说

秦始皇以赵为姓

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与流传

刘欣尚

季进

唐赞功

孙伦熙

曹正文

赵光贤

俞允尧

五原軍區學校
圖書資料

政治部研究室

1990

10

文史知识

1990年第10期

(总第112期)

• 治学之道 • 路越走越远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

罗宗强 3

淡泊自守的学者钱钟书

季进 9

• 文学史百题 • 记言与写心

——谈经史与小说的渊源关系

汪道伦 16

• 历史百题 • 吴楚七国之乱

唐赞功 22

• 怎样读 • 怎样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苏镇 28

诗
文
欣
赏

涉想神奇 辞采瑰玮——《楚辞·招魂》赏析

潘啸龙 31

布局谨严 意脉清晰

——读王安石《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

洪本健 36

黄遵宪政治思想的演变

——从集外佚诗《侠客行》谈起

钱仲联 40

• 古代科技漫话(39) • 中国古代的砖瓦

王月桂 崔衍东 43

文
化
史
知
识

中国封建皇帝的名位制度

柏桦 李春明 49

谈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三食”习惯

胡新生 53

漫话翁仲

周明初 56

宋代的医院

高林生 60

西汉中后期的奢侈之风

刘欣尚 孙伦熙 63

人
物
春
秋

勇而多智 屡建战功——五代著名军事家周德威

方积六 68

勇革积弊的县令——陆子通

孔凡礼 73

文武兼备 卓然大家

——明代散文家、蒲宗派主将唐顺之

黄道京 77

• 武侠小说漫谈 •

金庸古龙比较说

曹正文 81

读书
札记

《诗经》中的宣姜故事

金性尧 85

秦始皇以赵为姓 《史记·太史公自序》一

段话被误解

赵光贤 89

《聊斋志异》中关于清兵在山东屠杀的史事

牟小东 91

• 古代心理诗学(5) •

刹那间的直接把握——“即景会心”与艺术直觉

童庆炳 96

• 古典文学流派 • 别树一帜的阳湖文派

黄建民 102

语言
知识

汉语古今词义摭谈

彭翔鹏 106

“百里”与县、县令

张万起 108

• 青年园地 • 释“三昧”

伍皓 110

• 文史信箱 • 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与流传

俞允尧 113

• 文史信息 • 民俗对先秦文化的影响(21) 战国时代世风的变化(39) 南北朝史学异同(67)

百越史三题

李锦芳 118

• 文史古迹 • 洪洞明代监狱与苏三

贺海 122

• 文史研究动态 •

关于《离骚》创作时地研究的综述

江林昌 124

• 补白 3 则 • 中国园林的几个特点(35) 糊涂人(109)
简子放生(121)

宋代盔甲图(封二)

洪洞明代监狱(封三)



医药学院610 2 01478605

路 越 走 越 远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思想史的体会



• 治学之道 •

罗宗强

罗宗强，广东揭阳人，1931年生。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著有《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等。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但是如何研究，却至今仍在摸索，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研究路子是什么。我想，大概只能是走走、看看、想想，再决定如何往前走。这走走、看看、想想、再往前走，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与治中国古代文论，有同也有不同。二者都要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是同的地方；除此之外，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这是不同的地方。治古代文论的人多，治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人少，开始的时候，我便想用研究古代文论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国内研究古代文论的人，大抵是两种类型，一种是治文艺理论出身，另一种是治文学史出身，前者更重理论而后者更重“史”。就是说，研究同一问题，前者更重理论的阐释而后者更重史实的清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是大抵如此。我是从理论开始的。我想首先弄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各种理论范畴，然后再弄清各种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我就选了二十来个常见的理论范畴，如兴寄、兴象、

意象、气、风骨、势、体、神韵、境等等，多方收集资料，仔细辨认思索，想要考其原始，释其内涵，辨其演变。而采用的方法，大抵只是归纳法。例如“风骨”，只是把与风骨有关材料收在一起，归类排比，看有多少种含义。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资料收了不少，有些范畴的资料，可以说已经相当齐备。但是弄来弄去，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缺乏历史实感。古代的文学理论，原本应该是活泼泼的，有它们丰富的历史内涵。打个比方，十几年前我们文学界提出“反思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文化背景！以今类古，道理相似。每一个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有它们的社会审美心理、创作倾向的变化等等复杂原因。离开了这些原因，仅从资料的摘录排比来阐释这些范畴，便把这些范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舍弃了，把它们变成一堆僵化的东西。经过再三思考，我决意放弃这一路子，而改为研究文学思潮的演变。

于是我便从“论”转向“史”，搞断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开始。我力图用力于探讨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段落和各个段落的文学思想风貌、特点，它出现和消失的原因，演变的轨迹。而采用的方法，则是非常笨拙的。从读史开始，正史、杂史以至史评和当代学者有关唐史的论著，凡能找到的，一一找来读；然后又是读这个时期的集子，有关作家的传记资料、谱录等等，努力还原（或者说在史料提供的基础上想象）各个历史段落的社会风貌、作家群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研究每一段落的文学思想。

可以说，我把很大精力放在文化背景的了解上；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段落审美情趣、艺术追求的差异，我用了很多精力在审美鉴赏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主要是从诗文创作倾向的变化上反映出来的，而诗文创作倾向的变化，不细致地作审美的判断，便不易觉察。当然，我也注意作家心态的变化与文学思想变化的关系，考虑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作家心态的影响。但是，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联系，带着印象

式，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上。待到我接着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作家心态的研究便成了主要的内容了。

可能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吸引着我，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不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是很难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的。于是我又改变了我的研究路子，集中精力研究士人心态。这就是我撰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原因。

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甚为复杂，例如，政局的变化。中国的士人，与政治有着甚深的联系，政局的变化往往可以改变一代士人的心态，例如，东汉末年的党人事件，魏晋禅代之际的杀何晏、夏侯玄以至杀嵇康事件，都引起了士人极大的心灵震撼。司马氏为什么要杀何晏、夏侯玄，杀嵇康，而不杀阮籍？为什么向秀要入仕晋室而又要写《思旧赋》？这里面涉及中国士人与政权的复杂关系的许多问题，研究这些事件中士人的各种反应，推测他们的心态，对于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了解，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又如，社会思潮对于士人心态的变化亦影响至巨。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仿佛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历史力量，把士人不知不觉地卷了进去，而卷进去之后，他们心态的变化又进而煽起该思潮的发展。玄学思潮就是一例。玄学思潮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必然的过程。它从经学学风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经学学风的演变，事实上是慢慢地改变着士人的思想方法，从实证走向思辨，为玄学的出现准备了基础。而经学束缚的解除，自我意识的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提出了许多需要作出理论回答的问题，现实的需要催促着玄学的出现。而人物品评发展到清谈，又为玄学思潮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很容易被士人普遍接受的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使玄学思潮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不知不觉而又不可阻拦。它出现之后，便改变着一代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

又如，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教养，与士人心态亦关系甚大。研究闻喜裴氏和琅琊王氏的许多代表人物，便可以发现，同

一家族的不少人，心态有许多相似处。魏晋时期，家族文化实为决定士人心态之一重要因素。而对同一事件之不同心态反应，又往往因所处境遇不同而不同，刘琨和王衍死前对于西晋玄风的反思，就与南渡士人对于西晋玄风的反思有不同处，而他们在元康时期都同样是玄风的积极参预者。

上面这些，事实上涉及到许多领域上的问题，例如，历史领域和哲学领域的不少方面。而我的史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原本又都极差，于是只好从头学起，阅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著，而更主要的，是从士人心态的角度清理史料，对一些事件的方方面面作认真的思考。在研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时候，我读各种各样的史籍，目的只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各个段落的社会风貌有一个具体的印象，虽然阅读的范围很广，有关唐代的史籍能够找到的都找来读了，但是读的着眼点，只在于把它们作为文化背景资料，在形成社会风貌的印象之后，与其时的文学创作实际相联系，并不对某一具体事件作深入的探讨。研究士人心态就不同了，它涉及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这些具体事件不弄清楚，士人心态便无从谈起。而由于存世魏晋史料的缺乏，现存史料又真假混杂，给弄清事实真象带来许多困难。有时同一事件，各种史料的叙述差别极大，只靠史料本身的排比归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了，需要从各个角度对史料作周密的考析。有一些牵涉较广的事件，还要追索它的发展脉络，了解它的发展过程。例如，弑高贵乡公曹髦事件，牵涉到晋初士人心态的许多问题。这件事为什么直到十年之后还被提出来，并被卷入到入仕晋室的名士群体与司马氏心腹的激烈斗争中？这事在发生的当时，司马昭为什么要作那样原则上自相矛盾、依违两可的处理？为什么既杀成济又奖励贾充，既给王祥、司马孚加封又给王沈升官？为什么杀王经的四年之后又下诏褒扬他？这些行为的背后，反映着晋初名士群体的一种重要心态，也反映着司马氏在处理名教问题上的两难境地。在这两难境地中，只有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那便是依违两可。这种依违两可，后来在司马炎的许多施政措施中都出现过。而这依违两可，

又导致了政失准的；政失准的对西晋一朝的士人心态又产生了深远影响，等等。不把牵涉到这类事件的所有可以找到的材料都找出来，认真分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说了这些琐碎的事，是想说明，这离我当初从阐释理论范畴入手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史，已经距离颇远了。十多年前，当我研究理论范畴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搞心态研究这种搞法。路走得离原来的出发点实在是太远一点了。但是，我想，这是不是就与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疏远了呢？正好相反，我觉得对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的认识更有历史实感了。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再来搞文学思想史，我感到更具体、更真实，更充满了历史的活泼泼的生命。

我还想说明，研究的路子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走走，看看，想想，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大可不必守住一种研究方法、一条研究路子以定终身。别人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子，只是自己的参考，不必照搬。各人的气质不同，学养不同，研究对象的特点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各人的路。走自己的路，既不必畏惧也不必徘徊。当然要尽量少走弯路，但万一走了，也不必烦恼，改过来就是，关键在于要清醒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走一段之后静下来想一想，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二

古代文学思想史既是“史”，重视史实的还原与把握；但它又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重视理论分析。如何处理好论与史的关系，一直是这一学科很难处理又必须处理的问题。

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没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是很难有高层次的成就的。当然可以从事某一史料的整理，比如说，一辈子校勘一部书，弄得很精。这当然有很大贡献，为他人的研究提供可信的资料依据；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充其量它只是文学思想史史料学的工作。文学思想史（或者古代文论），它要研究的是理论现象，离开理论，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对

于理论素养如何理解，却就存有不同的认识。我以为理论的最根本的训练，应该是训练思想的敏锐性、思维的严密性和明快的把握问题的能力。如果理论训练的结果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去套文学现象，那应该认为是理论训练的失败。

但这个学科又属于历史科学中的一支，离开了史料，它就不可能存在。应该充分占有材料，研究一个问题，力求做到材料的详备，虽不能做到“所藏尽于此矣！”但至少应该做到力所能及的收集齐备。有的青年同志重理论，往往从他人研究成果中转引史料，这是非常危险的，应该自己收集，自己整理。在这方面，没有下苦工夫笨工夫，不可能成大气候。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往往为人所忽略，那便是资料的使用问题。因为这一学科涉及面广，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宗教思想等等有关系，当然也就存在着如何选择和解释这些方面的有关材料的问题。一种简单的最常见的方法，便是从字面联系上比附材料。这当然是一种省力的方法。但是它不可能说明文学思想与这些相邻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相邻学科影响文学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它往往是一种观念，一种情趣，一种人生境界的影响，材料的选择与分析当然应该从这种内在联系上着眼。这才是真工夫。

文学思想史是一个既充满思辨色彩而又充满感情因素的学科，没有较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要深刻理解文学思想现象是不易做到的。有意识地提高审美感受能力，对研究的深入或者会有帮助。

前面说过，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至今仍在摸索之中，知之甚少。这些肤浅的见解，必定贻笑于方家。我能说的唯一点经验，就是我在涉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虽步履艰难而始终感受到无穷乐趣，这或者就是甘于寂寞的力量之所在。

编者按：为了纪念钱钟书先生八十周岁生日，本刊转载苏州大学季进同志写的这篇文章，但愿不至因此而挨钱先生的板子。

淡泊自守的学者钱钟书

季 进

淡泊的钱氏与热闹的“钱学”

据说，哈佛博士资格考试的压轴难题，往往是要求学生列举本学科中最具“魅力权威”(Charisma)，即对社会起着示范和推动作用的具有领袖或先哲素质的精神导师，加以评析。我想，若是举行汉学博士资格考试，那么在可能列举的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中，恐怕不能也不应该忘记淡泊自守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生于1910年，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在几十年的文化生涯中，钱先生贡献了一批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和戛戛独造的学术著作，产生了恒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保持着挺进的犀利锋芒。他精通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既有深厚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化根基，又具备现代西方文化的广博知识。早在半世纪以前，吴宓教授就感慨：“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钱先生的《围城》被誉为“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学术著作往往使人“惊叹于他书卷子的丰富和才识的超群，顿生‘叔度汪汪如千顷陂’之感”（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舒展先生认为在学问方面，在文化思想史方面，在文艺鉴赏方面，在比较文学方面，钱先生有着许多“超越一切中国前贤的创见”（《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

然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钱钟书

先生并不喜欢人们对他的盛誉。他一生淡泊自守，埋首学问，这并不是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是生性超脱，对身外的一切漠然置之，视为累赘，有诗云：“雕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他只求杜门避嚣，悠然于自己美丽的学问境界。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在电话中求见，他回答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先生的淡泊既有其性情的因素，亦有其时世的原因。那段可怕的黑暗的时世使钱钟书的著作（主要是早期著作）绝难见到天日！以至有人以为是国外学者“发现”了钱钟书！其实，钱氏及其著作从来不乏知音，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管锥编》、《谈艺录》（补订本）的问世，钱氏声誉蒸蒸日上，令人瞩目，一门真诚而热闹的“钱学”正在悄悄地兴起。钱氏的各种著作一再重印，又旋即脱销；“钱学”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钱氏著作成为中外学者硕士、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一批扎实、广阔的“钱学”研究论文逐步涌现；《钱钟书研究》的专门性刊物新近在北京创刊。据说，上海一家书店以“围城”命名，一时读者竟趋之若鹜。学士通人中大有“交谈不说钱钟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势。

纷杂人生与早期作品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故取名为“钟书”。早年他由伯父抱养，以“痴”著名。他总跟着伯父去书摊上囫圇吞枣地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等小说，能把各种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也不认识。常常惹出多种事端被老师罚站，却混沌无所羞愧。他不记得自己的生年月日，穿鞋也往往不分左右。考大学时，数学只考得15分！钱钟书为此不曾少挨父亲——著名文史家钱基博（子众）先生（1887—1957，曾出版过《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的打。正是严父的打，使他有一次豁然开通，从此奋发读书，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基，并且很快崭露才华。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从此开始了对世界学

术文化的广泛涉猎。正是在春天的清华园，钱钟书与杨绛初次相识，并于1935年喜结良缘。随即双双同往古老的英伦牛津留学（钱钟书是英庚款公费留学，杨绛是自费留学）。1937年，钱钟书以《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后载1943年《北京图书馆刊》英文版）一文获得学位，然后两人同往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冯友兰先生破格聘邀钱钟书为文学院院长教授，两人在9、10月间同船归国。

其时，国家危难，抗战初起。钱、杨两家均避居上海。不久，钱钟书和杨绛也不得不在沦陷后的上海艰难度日，杨绛的《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剧作就产生于这段时期，“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古意》）正寄寓了钱钟书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

也许，正是纷杂的留学体验与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深谙自己所处身的文人圈的堕落与尴尬，使他更深刻地品尝到了人生的况味，这无疑激发了钱钟书的创作潜能，导致了早期作品的产生。其中，除《围城》和《谈艺录》外，主要是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这两个集子一开始就显示了钱钟书先生犀利劲捷、妙趣横生的浓郁风味。在其汪洋恣肆的笔下，在其联翩而至的想象中，既有对社会世态、文人世界的无情奚落，又蕴含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思索和真理追求。

《写在人生边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其中显示的钱先生用佯谬蕴含真理的思维方法。表面上这些散文只是业余消遣，有时近乎荒唐的闲聊，然而就在“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自己做的传”（《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这种矛盾、背反的话语中，你难道没有体会到一种真理和智慧的闪光吗？这种钱氏独特的语句，总让我想起杨绛先生所说的“痴气”。其实，这种根源于钱氏心灵深处的“痴气”，正是大智若愚。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钱先生能从司空见惯的平凡了悟中看出矛盾的悖论，进而发现真理。自成一格的《谈艺录》、《管锥编》颇得益于此。

如果说《写在人生边上》是智者的闲话，那么《人·兽·鬼》则

是智者的反讽。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调动了钱先生早年阅读西洋小说所积累的体验和贯通中西的学识素养，使其得以随心所欲地剖析知识社会的病态，抨击知识阶层人格的虚弱。“痴气”与“智慧”的糅合，赋予钱先生灵动的讽刺笔调。这在《人·兽·鬼》诸篇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妙趣无穷的智者的反讽，在《围城》被发展到极至。

《围城》，“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

《围城》动笔于1944年，1946年完成。先在杂志上连载，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并多次再版，曾掀起一股“《围城》热”。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不仅艺术形式浑简完备、圆润老练，而且艺术意味丰厚深刻，回味无穷。虽比不了莎学、红学的气派，它的研究者却也自成系统，遍及东西方了。

拿起《围城》的人便很难放下，它似乎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在你捧腹大笑的同时去回味和咀嚼。这种魔力便是幽默，《围城》首先是一部伟大的幽默小说。世上以浅薄的插科打诨式的噱头哗众取宠而又披着美丽的幽默外衣的作品实在不少，而只有《围城》这样的作品才能让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幽默。幽默作为一种精神，流贯于作者的笔端，以至形成了钱钟书独特的语句。

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暇，偶来陪他闲谈。这位庸医在本乡真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剩了三方。这种绝妙的语句仿佛山谷俯掇不尽的野果，随意熟堕在每一行、每一章。

《围城》的幽默首先得自于钱先生淹博的学识和睿智的思想。这使得钱先生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以至妙语联珠，新意迭出。每一对话、每一比喻，都珠玑似地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其次，《围城》的幽默不是从文字中挤出来的，而是钱先生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探寻作品的深层意蕴，但也不应该忘记文学终究是

幻象的世界。我认为,《围城》的幽默与钱钟书在长期的精神孤独中(请设想一下当年的时代文化氛围)渲泄自己秉性中的顽童心理的欲望密不可分。顽童心理与睿智思想的糅合,才会产生《围城》式的幽默:聪明、俏皮、精警以至尖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更深地理解杨绛先生的话:“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记钱钟书与〈围城〉》)

幽默的天敌是油滑,《围城》拒斥油滑的力量来自于作品的深层意蕴——对整个现代人生现代文明的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从情节结构看,小说以方鸿渐教育、爱情、事业、家庭的个人命运的戏剧,带动了一群现代知识者的命运戏剧,然而,借助于作者的幽默之光,看到的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和无聊的人群。作者讽刺、怀疑的笔触超越了特定的“方鸿渐们”而指向了整个人类的存在,立足于中国的土壤而展开了现代人生的整体反思。这种反思早在《写在人生边上》中已经展开,到《围城》获得进一步的升华。

《围城》不仅喻指爱情和当时的现实社会,而且象征着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方鸿渐们”普通平凡的生命历程因而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不仅是整个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而且是整个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写照(参见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小说的结句“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不难理解作者的序言“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不难理解为什么《围城》会成为现代最伟大的中国小说。

自古难觅是奇书——《管锥编》

抗战后期,兵荒马乱,作者“兵罅偷生”,在授课之余发愤著书,终成《谈艺录》(1948)。这本札记式的文学批评计有正文91则,附说26则(而1984年的补订本篇幅整整扩大了一倍!),主要是论析唐代以还的诗文、诗话,寻求东西之文心,充满着真知

灼见。无论在批评方式，还是美学形态上，均为后来的《管锥编》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钱钟书先后担任湖南蓝田师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3年起成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潜心数载，撰成《宋诗选注》(1958)，独标“六不选”原则，被誉为与萧统《文选》并举的选学史上的里程碑。

这之后的二十个春秋，钱钟书先生除参加过这两部书的集体撰写外，只发表过几篇零星文章，后来与新写的几篇先后辑成《旧文四篇》(1979)、《也是集》(1984)、《七缀集》(1985)出版。

1979年，《管锥编》煌煌四卷巨著问世。这部精博的著作评骘了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融经史子集于一炉，几乎囊括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堪一道的是，当年钱先生自述《谈艺录》“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时值抗战后期。岂料《管锥编》竟又成一部“忧患之作”，产生于中华历史上又一艰危时期，孕育于黑暗中的巨著凝聚着钱先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怀，表现了一个知识者“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通客，宁作累臣”(《管锥编》第二册，第597页)的风范；显示了钱先生“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柯灵先生语)的超然境界。

钱先生才识淹博，记忆力极强。据说，凡经他浏览过的典籍，哪怕是野史笔记，他都过目不忘。沉重的大部头辞典、百科全书他竟挨着字母逐条细读。精奥难解的理论著作对于他只是零食而已。这种惊人天赋与勤奋，使钱先生得以通过札记随笔紧扣一得，旁征博引，既有最新的西方典籍〔狄尔泰(W. Dilthey)的阐释理论就是钱先生最早引进并加运用的〕，也有世人不屑的笔记戏曲以至谣谚。书中仅征引到的西方学者和作者多达千人，四五种语言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百种之多。

然而，如果只有繁征博引，便难逃矜奇炫博之名，关键在于以自己的睿智去涵括、溶化。钱先生坚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致力于探寻中西普遍的诗心与文心。他的著述不是皮毛表象的附会，而是突破了学术与中西藩篱，文、史、哲以至心理、语言等等融于一炉，达到了“化”的境界（钱先生认为这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正所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管锥编》第四册，第1251页）。钱先生以其博学与睿智，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卓然神化为一家“钱学”。这与国际比较文学界“科际整合”的精神不谋而合，且显示了绝妙的实践。

《管锥编》植根华夏，融化中西，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皆以最经济曼妙的文言笔记以实涵虚，真知灼见点到为止。据郑朝宗先生研究，该书仅谈艺部分有重大发现可视作定律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诸如通感、比喻之“二柄”与“多边”、诗文之词虚而非伪、写忧而造艺等等，令人拍案叫绝。而容纳这一切的是典雅奥丽却又潇洒自如的文言。这一方面是尝试文言容纳新思想的弹性；另一方面，笔精墨妙，以简御繁，宁纳须弥于芥子的精神不正是钱钟书先生清明品质的又一写照吗？

（本文原载《国文天地》1990年1月号，本刊略有删改）

宋代的盔甲

（封二介绍）

宋代的军戎装束，头上戴的叫做盔，也称兜鍪；身上披挂的叫做铠或甲。用铁做成的叫路盔、铁铠、铁甲，用皮做成的叫皮笠子、皮甲。据《宋史·兵志》记载：全副铁盔甲由1825片甲叶，用皮线穿联成披膊、甲身、腿裙、鹞尾、头盔、头盔帘、杯子、眉子等部件。南宋时又将肘臂间转伸处的铁叶改用皮制以便于屈伸。还造了一种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并将兜鍪减轻。除了这种全身披挂的锁甲外，另有一种只掩前胸和后背的，叫做裯裆甲。

宋代的甲冑形象，在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和陈祥道的《礼书》中可以见到，在河南巩县宋陵出土的武士俑和壁屋中也可见到。（见封二）

记言与写心

——谈经史与小说的渊源关系

言为心声，从中国的记言文学来看，确实如此。中国经史中的记言，实际上是记志、记性、记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指出：“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这话说得不错，“记言之文”确实必须是“适如其人之言”。同是写历史，记言要比记事难。因为“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而“记言”必须是人的心声，必须把人的情、志、意都恰如其人的表现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又恰恰是中国经史写人的一条重要经验。

杜预《春秋序》把《春秋左传》的体例归为“五体”，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其中除“惩恶而劝善”是指思想意蕴外，其余四体均和语言功力有关。特别是“微而显”的语言，对后世影响甚大。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籍语言的特点概括为：“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就是“微而显”的史家语言的功力。特别在写人方面，这种“微而显”的语言对后世小说的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经史的记言来看，“微而显”的语言，大概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用语精严，小中见大；一是迂徐含蓄，委婉多切。

在经史记言中，用语精严，小中见大的语言较为普遍。《论语·雍也》篇记孔子夸孟之反的谦逊精神：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打了败仗，主动殿后，为了消除争先恐后败逃者的愧赧心理，而以“策其马”来表明殿后是马跑不快的缘故。语言和心性正好构成表里关系，在表现他谦逊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他勇敢、缜密的性